

# 另一种“边缘化、外在化、知识化”

——从一种中国语境的视角谈现代中国道德教育的异化现象

余维武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摘 要:** 鲁洁先生在她的论文《边缘化 外在化 知识化——道德教育的现代综合症》中,系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中教育与道德教育所产生的边缘化、外在化与知识化等异化与弊端。然而,只有从现代中国的语境出发,从分析现代中国道德教育机制入手,才能全面深入揭示中国这个具体场域中现代道德教育异化的现象及其原因。

**关键词:** 道德教育; 知识化; 外在化; 边缘化; 中国语境

鲁洁先生在她的论文《边缘化 外在化 知识化——道德教育的现代综合症》指出,教育是人的—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所指向的是人自身的存在,指向人的发展和完善。人是在教育的引导下,通过在主体间和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中所实现的经验改造和意义建构而发展、完善自身的。教育所关注的是人自身价值的提升,它的核心旨趣是人存在的意义。然而,当代教育在现代化的转型中发生了变异,它从指向人自身的存在,指向人的发展和完善,变异为征服、占有世界的工具。而道德教育的本意不在使人拥有某方面谋生的本领,只在使人成为人,因此在现代的功利主义教育中它被边缘化。当代在“道德的名义”下唯一可资利用的价值就是用道德规范和规则去把人组装在科学理性主义的大机器上,道德教育就蜕变为注入规范、规则的外在化教育。道德之知本是一种实践之知,当代的道德教育却以普遍化、客体化的知识割断了与生活与实践的联系,从而走上了一条唯知识化的路。<sup>1</sup>

鲁洁先生这篇论文,在我国道德教育理论界较早系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中教育与道德教育所产生的边缘化、外在化与知识化等异化与弊端,对于审视与反思当前我国道德教育的弊端,从而回归教育与道德教育原有的完善人自身的本真目的,建构生活论德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然而,鲁洁先生对于现代道德教育的异化的分析,照我看来,仍有未尽之意,这就是仍然缺少一种从中国的语境来分析中国这个具体场域中现代道德教育的异化的现象及其原因。在本文中,我不揣浅陋,试图接着先生未尽之意说下去。

在分析现代中国道德教育的异化现象前,需要先分析我国最近数十年以来道德教育的机制开始。

由政府官员担任道德教育者,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古人的治国理念中,政府官员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或治理者,在德行上修己以治人,由“明明

---

<sup>1</sup> 鲁洁:《边缘化 外在化 知识化——道德教育的现代综合症》,载《教育研究》2005年第12期。

德”而“新民”，由“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平”的关键，则在于先修己身，率先垂范，示教万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万民则以圣王、君子为楷模，受其教化。这就是古典中国以德治辅助治道的传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沿用了类似的做法。这种以德治辅助治道的做法，最典型的表达即是“以德治国”。

按照执政党的话语逻辑，执政党拥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这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性使它具有教育民众的道德正当性和资格。按照这种话语逻辑，执政党是唯一能够挽救民族危机的党，是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救星”。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中国共产党既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的基础上，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sup>2</sup>因此“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sup>3</sup>所以，毛泽东信心十足地宣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sup>4</sup>另一个党的领袖刘少奇也在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一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力量，在于它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且把这种智慧表现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动。不但在过去，而且在今后，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有效地处理国内和国际的复杂事务，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党的领导。”<sup>5</sup>至于邓小平，他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定位在五四以来唯一一个联系群众的政党位置上，认为“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关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改变的。”<sup>6</sup>另一方面则将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连接起来，再一方面更认定“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下。”<sup>7</sup>正因为执政党的领袖认定党掌握着拯救和复兴民族和国家的“唯一科学的真理”，因此执政党当然地对全社会取一种道德教化的“导师”姿态。故而，在我国，真正的道德教育者，不是学校和学校教师，而是执政党和国家。执政党和国家往往直接制订道德教育的目的、内容、途径和方法，对民众和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或者各种教育部门和机构根据执政党和国家的有关指示，制订道德教育的目的、内容、途径。

笔者认为，在中国逐渐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这种特有的道德教育机制，是导致道德教育异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种导致异化的因素，是我们在努力创建一个健全的道德

---

<sup>2</sup>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6 横排版，第 994—996 页。

<sup>3</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66 横排版，第 614 页。

<sup>4</sup>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6 横排版，第 999 页。

<sup>5</sup>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9—630 页。

<sup>6</sup>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6 页。

<sup>7</sup>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70 页。

教育机制所不能回避的。为何这样说呢？下面试申述之。

先生在分析现代社会道德教育的异化时，是按照边缘化、外在化与知识化的顺序来阐述的，然而，照我看来，如果从中国的语境出发来分析问题，这个顺序应该颠倒过来，即按照知识化、外在化与边缘化的顺序来分析，才能更好地深入揭示出现代中国道德教育的异化现象。

## 一、中国道德教育的知识化（真理化）

在最近数十年所建立的道德教育的机制中，首先道德教育的内容是由国家权力的拥有者所决定、所规定的。在这种体制下，政治权力的中心即是道德真理的生产中心。掌握了政治权力的政党组织，利用所掌握的世俗权力，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为指导，制定某种“最先进”、“最科学”的道德价值观体系，把这种道德价值观体系推行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当中以及学校教育体系中去，并且要求每个人都予以遵守。这种道德教育的进路是：有一个代表了人类先进阶级的组织，这个组织成员由具有特殊材料的人组成，这些具有特殊材料的人既具有高尚的品德，又掌握了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能够发现和掌握人类发展的规律。由此，由这些品德高尚的人，根据人类最科学、最先进的思想和方法而提出来的道德原则、道德规则，理所当然地代表了人类道德发展的方向，揭示了人类道德生活的真谛，因此也应该是指导人类进行道德实践、达到道德完善的依据。在这种视野下，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当然应该以这些道德原则、道德规则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

在这种机制下，政治权力中心制定的道德教育内容，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知识，而是具有真理性的道德知识，是代表了人类发展方向的道德真理，是不容许公开质疑和否定的，道德教育的内容由此成为了不容置疑的道德真理知识。

在这种道德知识观下，具体的道德教育者必须根据政治权力中心规定的道德知识，编写有关道德教育的教材，在具体的道德教育过程中努力贯彻传达这种道德真理知识；受教育者则必须努力内化，加以接受这种道德真理知识。

这种道德真理性知识虽然通常并不容许具体的道德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加以质疑否定，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权力中心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会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生产、提倡新的道德真理知识，交由下一级权力部门和具体的教育机构传达、学习、体会和贯彻。

在这种道德知识的生产机制下，正如哈耶克所说的，“真理这个词的本身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它不再说明某种有待发现的东西，只有个人的良心才能判定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它的证据（或者提出证据的人的身份）会成为一种信仰的理由；它成了某种要由当权者规定的东西，某种为了有组织的一致行动的礼仪必须加以信任的东西，并且是在有组织的行动有迫

切需要的关头又必须加以更改的东西。”<sup>8</sup>因此，在具体的道德教育过程之中，向受教育者教导、灌输这些代表了人类先进方向的“道德真理知识”也就成为了道德教育的目的。

## 二、中国道德教育的“外在化”

检视人类历史上的道德实践，道德要在道德实践者中具有权威，或者是来自某种超验的存在，例如在各种宗教体系中存在的道德原则。在信奉这些超验性宗教的信众心目中，蕴含在宗教教义中的道德原则、道德规则由于具有神圣的性质，而被信众所笃行。或者社会共同体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地形成的、经过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检验，证明能够良好地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且得到人们认可的优良道德规范。这是一种自然地从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实践内部产生的道德价值观。这是一种扎根于人们的生活世界的“内生型”的途径。

无论从道德来源还是从道德的功能来看，道德总是产生于人类的现实生活需要，并且是为了促进人类个体的自我完善与人类群体的繁荣的，这即是梯利 (Frank Thilly) 所指出的，“个人与社会生活的保存和发展是至善，是人类的目的”，因此也是伦理道德的目的。<sup>9</sup>伦理道德的根基在于它首先是人的现实存在方式、生活方式、实践方式之一，而不是仅仅发生于人们观念中的东西；因此它必然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相联系，并由此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强有力地创生出来。伦理道德的内容和本质，在于体现和维系人的社会生活所依赖、所需要的社会关系的结构、秩序和规则，因此它必然就存在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之中，并且与人和现实生活的现实一道，呈现其具体的历史的面貌。也就是说，伦理道德总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现实中“内生”的。

所谓“内生”的道德，是“由于客观上人们共同活动和交往的社会关系结构、特定的活动方式及其条件等本身，向内、向下提出了一定秩序或规则性的要求——这些要求是维持这一社会系统或活动方式的存在所不可缺少的——并促使有关的人们在意识和行为中普遍地适应这些要求，从而产生了这一系统中的伦理道德”。<sup>10</sup>应该说，“内生”是任何社会现实、尤其是世俗社会当中合理的伦理道德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方式、真实途径。因此，要寻求建构一种合理的、能够得到人们的承认与遵从的伦理道德的根基，不能只在头脑的意向中去寻求答案，而应该首先到具体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去寻找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本身提供的条件和要求，其中当然包括人们切实的利益结构和权责状况等；也不能把只能适用于某个团体、某个阶段、某种范围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无限度地进行推广。“某个生活本身在什么样的范围和条件下进行，它建立在怎样的结构关系上，它要求怎样的秩序和规则，就必然产生什么样的伦理道德”<sup>11</sup>。道德的产生过程是基于生活的，是为了生活的。在这个道德的产生过程中，

<sup>8</sup> 哈耶克著，王明毅、冯兴元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5 页。

<sup>9</sup> 弗兰克·梯利著，何意译：《伦理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1—182 页。

<sup>10</sup> 李德顺：《普遍价值及其客观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 6 期。

<sup>11</sup> 李德顺：《普遍价值及其客观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 6 期。

没有谁可以垄断道德的产生和发明，道德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以他在共同体的生活实践、道德实践，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共同体的道德的创造。

正如上面所述的，在最近数十年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当中，主导的道德价值观体系，是某个掌握了政治权力的政治集团，利用所掌握的世俗权力，制定某种以维护其集团利益为主要目的的道德价值观体系，把这种道德价值观体系推行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当中，并且要求每个人都予以遵守，以求得社会道德的统一。这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外推型”途径。<sup>12</sup>

我们应该可以看出，这种“外推型”途径，即利用世俗权力强行推行某种道德价值观体系的做法，在当今的民主多元社会当中已经难以行得通。在当今价值观越来越趋于多元的背景下，在道德知识的产生过程中，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不排斥人们的主观设计，其中包括政治家、思想家们的主观设计，包括某些强有力的个人或团体凭借自身势力的“推销”。但是，任何人、任何团体的主观设计或“推销”都必须得到现代多元化社会中普通公民的普遍认同，即在理论与实际中均符合不同文化和价值背景的目的、利益、需要以及现实条件。如果仅仅是自我感觉其坚持的道德价值观念“最先进”、“最合理”，就企图将自己所认可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粗暴地强加于一切人，这种强加于人的“普遍道德”，尽管时常得到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或强制教化等外力的支撑，但往往由于缺少现实生活中来自具体价值主体的普遍性根据，从而并不能获得人们自觉的普遍认同和奉行。实际上，这是犯了把“先进”当成了“普遍”、把“合理”当成了“合法”的毛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实践当中也是行不通的。

而正是因为最近数十年的道德知识这种生产方式，是导致了道德教育的外在化一大重要因素。因为当道德之知不是出于人的道德生活实践，而是出于权力的规定时，实际上，道德教育就已经外在于人的心灵而异化了。正如洛克所说的，良心自由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真正的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动力，只在于内在心灵里的确信”，“悟性的本质就在于，它不可能因外力的原因而被迫去信仰任何东西”。因此，固然每个人都有责任去规劝、勉励和说服谬误者，并通过说理引导他领悟真理，但任何人都无权来决定应该遵从何种信仰和宗教。真理正确与谬误的裁决权只在上帝。个人的灵魂属于自己掌管，政府无权强制。<sup>13</sup>洛克虽然说的是宗教信仰，但也适合于道德和道德教育。这种借助于权力，没有广泛坚实的生活基础的道德和道德教育，只能是外在于人的心灵的。一旦失去政治权力的支撑，就必然会分崩离析。

同时，由这种道德知识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道德教育方式，也导致了这种道德教育的“外在化”。

按照这种道德真理知识的生产逻辑，这种最先进的道德、最科学，代表了人类发展方向的道德，是只有最先进的阶级才拥有，是只有代表了先进阶级的政党组织才能认识的。因此，为了把这种道德真理知识成为普遍化的、指导整个社会道德生活的道德知识，就必须把这种

<sup>12</sup> 李德顺：《普遍价值及其客观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sup>13</sup> 参见洛克著，吴云贵译：《论宗教宽容》，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7页。

道德知识灌输给其他尚未拥有这种道德知识的人。

按照执政党的话语逻辑，执政党代表着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根本的方向上，二者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虽然广大工农大众是革命与建设事业依靠的对象，但由于各种原因，在价值观与思想观念上还保留了许多落后狭隘的地方，因此就有必要向他们灌输先进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列宁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sup>14</sup>工人群众在自己日常的实践和自发的斗争中，“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可调和的对立”，<sup>15</sup>工人阶级“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sup>16</sup>他进一步阐明了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意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sup>17</sup>“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sup>18</sup>因此工人阶级政党必须把由革命的知识分子所创立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也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sup>19</sup>在新中国成立后则强调“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思想”。<sup>20</sup>因此，为了让民众认识到党和国家的远大目标，为了远大利益而克服狭隘短视的眼前利益，就必须把先进的思想观念与道德意识从外面灌输给民众。

在这种灌输论的视野下，由于这种最先进、最科学的道德知识只能为最先进的少数人所最先掌握、所认识，并据此而指导个体的道德实践，而其他大多数人则因为各种原因，不能自发地理解、掌握这种道德知识。因此，为了帮助大多数人掌握这种道德知识，就必须通过外部灌输的方法，从无到有地灌输给人们。由此，个体道德品质的生成，不是个体在他所生活的道德环境中，通过主体和主体间积极主动的道德实践而获得的，而是通过外部的灌输，并根据外部灌输的道德知识而指导自身的道德实践而获得。也即是说，这种外部灌输论实际上隐含着，这种最先进、最科学的道德知识，在大多数人的实际的道德实践中，是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的，是外在于大多数人实际的道德实践活动的。

### 三、中国道德教育的“边缘化”

按照鲁洁先生所言，在现代发生了变异的教育中，道德教育处于边缘化的境遇。在现代西方国家的教育中，道德教育的边缘化境遇，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在现代功利主义的潮流之下，道德教育“不能使人具有某种征服、占有世界的本领”，从而“必然地被判定为‘无用’

---

<sup>14</sup>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7 页。

<sup>15</sup> 同上。

<sup>16</sup> 同上。

<sup>17</sup>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1 页。

<sup>18</sup>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2 页。

<sup>19</sup>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366 页。

<sup>20</sup>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44—245 页。

的教育”，<sup>21</sup>但也由于现代价值观多元的社会现实带来的巨大冲击。在价值观多元时代，意味着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价值观体系，意味着不同的对于善的生活的理解，那么，要进行道德教育，首先就面临着“教谁人的道德”？“谁人的价值”？（Whose morals? Whose values?）在当代西方民主社会承认不同族群文化的价值，政教分离、尊崇个人信仰自由的社会背景下，这个问题是如此敏感，以至于如果要在学校当中进行道德价值观教育，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面对这个敏感问题，由此在西方社会价值观多元背景下，便产生了“去道德化”应对策略。所谓“去道德化”应对策略，是指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文化与价值观多元的社会现实，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公立学校中，只以知识技能教学为限，避免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道德教育。

对这种在公立学校中避免进行任何道德价值观教育的状况，价值澄清学派的代表人物拉思斯（Louis E. Raths）曾经做了这样描述：学校“开始因提出单一的宗教价值而受到人们的批评。学校曾经庆祝基督教节日、圣诞节和复活节。其他宗教团体和非宗教团体对这一惯常做法提出了异议，认为学校不应只代表一种宗教而排除其他宗教。结果，学校改变了有关庆祝宗教节日的惯例。学校过去极为重视每天的祈祷，但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规定，学校不应该要求所有的学生每天进行祈祷。与宗教问题一样，人们也深深关注其他问题。假如有人支持一件事，别人就会起来反对。为了避免争议，有些学校开始对任何事情都不予支持。”<sup>22</sup>而“作为对这种混乱状态的反应，教师转而‘教授事实知识’。如果争议是令人烦恼的，教师就会置身事外。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往往喜欢那些不提出‘问题’的教师。在充斥陌生人的团体内，背景各异的人们互不相识，学校更加容易表现出意见的不一致。作为课程固有部分的道德价值、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暗暗被遗弃。”<sup>23</sup>

这种在公立学校中避免进行任何道德价值观教育的做法，在今日的一些西方国家中，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在那些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与宗教复杂的国家中尤其明显。例如，我国一位学者近年到澳大利亚访学期间，曾经征询澳洲一些中小学教师：“学校要不要进行道德教育（价值教育）？”结果这些被询问的教师面对这样的问题均表现得很诧异。因为他们认为，在学校进行道德教育仿佛是“天方夜谭”，道德教育应该是家庭的事。<sup>24</sup>

与西方发达国家道德教育的边缘化不同，这几十年中，很少有国家像中国政府一样，对道德教育念兹在兹，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例如，近年来，仅仅是一项“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行动”，仅仅是江苏一省，省财政就每年安排5000万元之巨，用于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经费投入。<sup>25</sup>至于投入的部门人力，更不必说。从最高一级的权力部门到地方各级权力部门，再到各级各类学校，均设置有专门的机构、部门来主管道德教育

<sup>21</sup> 鲁洁：《边缘化 外在化 知识化——道德教育的现代综合症》，载《教育研究》2005年第12期。

<sup>22</sup> 路易斯·拉思斯著，谭松贤译：《价值与教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sup>23</sup> 同上，第19页。

<sup>24</sup> 丁锦宏：《“去道德化的教育”现象刍议》，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8期。

<sup>25</sup> 参见江苏省文明办编：《江苏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材料选编》第17页。

（建设），最高权力当局和各省政府、教育部门更是频频发文，要求加强道德教育；从小学到研究生阶段，皆设置有专门的思想道德教育课程，从中考开始，一直到研究生入学考试，均规定思想道德课程为必考科目。在这种背景下，要说我国的道德教育被边缘化，可就令人觉得十分奇怪了，然而事实确乎如此。

我国目前道德教育的边缘化，笔者以为，除了确实是如鲁洁先生所言，在现代功利主义的浪潮下，道德上的完善并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之外，尚存在着其他的因素。

按照鲁洁先生的观点，教育的本真目的本是指向人自身的存在，指向人的发展和完善，道德教育的本意不在使人拥有某方面谋生的本领，在于使人成为人。但在最近这数十年以来，教育与道德教育本身的目的却不是指向人本身，而是指向人之外的事物。然而，在现行的道德教育机制下，道德教育的目的却不是指向人的本身，而是指向人的本身之外的目的。

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政治权力的中心即是道德真理生产中心的观点，让我们还是从政党领袖的言论出发来进行分析。毛泽东在论述共产主义道德的宗旨之时，曾经提出了一种“革命功利主义”道德观。毛泽东认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sup>26</sup>毛泽东的这种“革命功利主义”可以表述为：个人品德上的大公无私，而个人大公无私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和集体服务。这种“革命功利主义”强调动机和效果的结合，“即道德行为的好坏，既要看法（主观愿望），也要看效果（社会实践）”。<sup>27</sup>首先，在个人的道德行为与道德实践上，应该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从而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sup>28</sup>其次，在道德实践上的大公无私是为了革命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毛泽东批判“董仲舒们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道义论是“唯心的骗人的腐话”，<sup>29</sup>提倡一种以利益为标准的功利主义道德评价标准；认为道德与利益具有一致性，道德以利益为基础并为一定的利益服务；强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为道德评价的最高标准。在理论上，虽然强调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相一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统一，但在实践上，由于整个社会体制为国家公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的一切利益来源均属于国家与集体，单个的人不复存在，而是以“国家人”、“集体人”和“单位人”的形态存在，因此，个人利益实际上绝对从属于国家与集体利益，个人成为了国家机器与集体利益的“螺丝钉”。

在这种“革命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视野下，“道德”本身不具有自足的价值，个体本身也不具有独特的价值，无论是道德本身还是个体道德上的完善本身，都沦为所谓的维护、促

---

<sup>26</sup>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821 页。

<sup>27</sup> 同上，第 868 页。

<sup>28</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621 页。

<sup>29</sup>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65 页。

进“国家利益”的工具。这种“道德教育工具论”和“人的驯服工具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的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虽然已经逐渐削弱，但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在政府权力主导的道德教育中。例如，政府主导的道德教育就一直称之为“道德建设”，为落实这种政府主导的“道德建设”所采取的措施、行动则称之为“工程”。不管是“建设”还是“工程”都是一种工业化用语。在这种带有浓厚色彩的工业化用语中，分明可以体会到在政治权力部门的心目中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工具论色彩，“道德建设”和“道德建设工程”所指向的对象，依然是被视为工具的物化了的“人”。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在如今个体自主意识、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情况下，个体如何还能依然在这种不把人当人看的“道德建设工程”中心甘情愿、服服帖帖地做一只“螺丝钉”，一块“砖”，一片“瓦”？由此，这种“道德建设工程”之不被受教育者所接受也就是可以预料的了。而一种不被受教育者从内心深处接受的“道德”和“道德教育”又如何得到他们的重视，从而被受教育者置于受教育过程中的中心位置呢？实只不过是受制于种种制度化的限制（如学业的升级、入学、就业等等），不得不做形式上的重视罢了。

这种“道德建设”之不被受教育者所重视，还因为有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种“道德建设”机制之下，政府官员即是道德建设、道德教育的承担者。在这种机制下，政府及其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的道德水准和道德形象必然对教育对象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但是，政府本身不是也不必是道德的化身，公共权力的运作者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他们并非是经过道德的筛选和净化而选拔出来，而且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还时刻存在着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危险。那么，当前政府官员在民众心目中、在道德建设的对象心目中的道德形象又是如何呢？在一个 2005 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05&ZD040）所作就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全国性调研中，关于“你对哪些人的伦理道德状况最不满意？”的调查发现令人沉思：政府官员高居榜首，达 74·8%。<sup>30</sup>可见政府官员的普遍的道德腐败已经被大多数人所确认。可是，政府所推动的道德建设，如果连政府及其成员都缺乏道德，或者说都置其所宣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于不顾，那么这种道德、这种道德建设或者道德教育又有何说服力呢？实际上，当那些口口声声“关心下一代”并掌握社会权力的政府官员却在“怀中抱着下一代”时，<sup>31</sup>当那些口口声声对着民众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公职人员，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的实利哲学时，并且此种态势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空气时，这种道德和道德教育、道德建设就已经破产了。

由此，根据笔者在本文中所分析的，当前中国道德教育的边缘化，不是没有在制度上的设置予以重视，而是由于在当前的道德教育机制下，所提倡的道德、所进行的道德教育由于其虚假性、工具性，难以被道德教育的对象从内心上加以接受，从而基本上处于破产的境地。实际上，当一种“道德”和“道德教育”与个人的美善幸福生活没有必然关系时，当一种“道

<sup>30</sup> 樊浩：《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及其精神哲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sup>31</sup> 如邓玉娇一案所揭示的。

德”和“道德教育”业已证明是虚假时，这种“道德”就已告破产，而“道德教育”被受教育者边缘化就是必然的了。

#### 四、结语

鲁洁先生在她的《边缘化 外在化 知识化——道德教育的现代综合症》一文中，深刻揭示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功利主义、物质消费主义以及唯理性主义所导致的道德教育的异化现象。然而，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独特的语境下，导致道德教育的异化的，除了先生所揭示的原因之外，尚有中国最近数十年来独特的道德教育机制所存在的弊端。实际上，在当前中国，现代功利主义、物质消费主义以及唯理性主义和中国这种独特的道德教育机制所带来的弊端纠结在一起，使得导致我国道德教育发生异化的因素比西方现代发达国家还更加复杂，由此，对于建立一种健全的道德教育而言，则可能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困难。面对这些困难，需要每一个有志于改善这种异化的道德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付出绝大的毅力和勇气，去做出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令人欣慰的是，以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者和实践者业已迈出了坚实的脚步。

Another Kind of Margin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and Knowledge:

Discuss the Dissimil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from the View of Chinese Context

Yu Weiwu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In Prof. Lu Jie's paper *Margin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and Knowledge: the Modern Syndrome of Moral Education*, some dissimil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has been revealed deeply, such as education's margin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and knowledge. However, only if from the modern Chinese context, beginn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moral education system in modern China, the dissimil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nd its reasons can be revealed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 moral education; knowledge; externalization; marginalization; Chinese context